

共产国际 与 中国革命

苏联学者论文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苏联学者论文选译——

徐正明 许俊基 等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汪伊举

封面设计：曹辉禄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徐正明 许俊基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309千

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50册

书号：3118·311

定价：2.45元

内部发行

译 者 的 话

六十年代以来，国外对“中国学”的研究十分重视。在苏联，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除莫斯科设有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以外，在列宁格勒、基辅、海参威等城市也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机构。近十年来，苏联学者陆续撰写了许多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文章和专著，披露了一些目前只有在苏联才能看到的文献和资料，还出版了批驳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有关这方面观点的论文集等。这些对于我们了解苏联学者在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进展情况，提供了不少可资参考的材料。为了使我国党史教学研究人员和国际共运史教学研究人员了解这方面的动态和资料，我们选译了一些文章，编成这本《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

本书收集译文共计十九篇，主要是苏联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B·格鲁宁、M·尤里耶夫、K·库库什金、A·格里哥里也夫、A·卡尔图诺娃、M·佩尔西兹、K·舍维廖夫等人的文章和专著摘录。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学者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故有研究价值。

M·佩尔西兹的《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料》，考证了1921年

《远东人民》杂志第三期刊载的《中国代表团的报告》一文，认为它出自张太雷之手。报告提到1921年的“三月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有着直接的联系；分析了报告中谈到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动力以及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问题。K·舍维廖夫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略》、A·卡尔图诺娃的《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论述了苏俄共产党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联系和帮助，评价了中共“一大”。这两篇文章，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水平，有所贬低，夸大了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作用。

B·格鲁宁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1920年——1927年）》，是从反驳西方学者观点的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东方》一书中选译出来的一篇长文章。作者竭力贬低早期中国共产党，说她在1925年以前“还是一个带浓厚小组性质的党”，说1921年至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由马克思主义宣传小组向真正的政党“过渡的时期”。文章对共产国际帮助中共“二大”制定正确的纲领以及1923年作出国共合作的正确决策作了较多的论述，但对国民党估计过高，说“领导革命的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作者错误地认为，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弱小，无产阶级领导权只是“遥远的目标”；要“通过民族革命党”的“媒介”来实现“间接领导权”；指责中共“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从“左”倾宗派主义观点出发的。文章批评了斯大林在1926年11月提出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说它带有“主观主义成分”。这样，对于1925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作者作了完全歪曲的分析。

K·舍维廖夫的《中国统一战线的经过史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M·尤里耶夫的《1921年——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孙逸仙之间合作的建立》，A·卡尔图诺娃的《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的一些问题》，B·格鲁宁的《1926年“三·二〇”事件后的中共策略问题》，B·格鲁宁、M·尤里耶夫的《1925年——1927年中国革命》，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一些史料，是值得肯定的，但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时对统一战线缺乏认识，是所谓的“宗派主义立场”；对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卅”运动期间的坚定立场和对戴季陶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潮的批判，斥之为“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性”，是“左”倾错误。认为发生“三·二〇”事件的重要的主观原因，是广东党组织的“左”倾错误，竭力为共产国际的退让政策辩护。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革命军队、革命战争和农民的作用，说成是“专制化”、“军阀主义”，是“对其他斗争和组织形式的轻视”，“对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轻视”。这些观点是必须加以批驳的。

A·格里哥里也夫的《共产国际与在苏维埃口号下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年——1930年）》，在充分肯定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纠正一、二次“左”倾错误，肯定中共“六大”成绩的同时，却回避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代表执行“左”的指导方针这一事实，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立三路线同毛泽东的正确立场联系在一起，把1929年向赣南闽西的进军说成是“冒险主义计划”。

A·季托夫的《论遵义会议》，是一篇颠倒黑白的文章。作者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挽救中国红军、挽救中国革

命的伟大作用和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诬蔑为“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为王明、李德的错误思想路线和军事路线作了颠倒是非的辩解；对宁都会议、黎平会议作了完全歪曲的评价；把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归之于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把毛泽东既反对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又反对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说成是“自相矛盾的”；攻击毛泽东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史料价值，它是根据王明的《中共五十年》、李德的《中国记事》的谎言与诡辩拼凑而成的。因它具有代表性，我们也选译了，供我们分析批判。

K·库库什金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1943年）》，A·季托夫的《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作者论述共产国际“七大”和我党的《八一》宣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同时，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制定的一整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抨击，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作了完全歪曲的评价。作者不强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抗日要以蒋介石为中心，为王明的新投降主义辩护；攻击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夸大共产国际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造谣说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反对同蒋介石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攻击我党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是既反日又反蒋的冒险主义方针；诬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积极抗日而指望苏日开战，然后“借助苏军力量

打败日本同时摧毁中国国民党政权”；为蒋介石的片面抗日路线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立场辩护；攻击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和放手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消极抗日”，“破坏统一战线”。此外，作者有意歪曲历史事实，指名攻击王稼祥，否认共产国际领导人曾讲过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

总起来看，这些文章基本上采取全面肯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的态度，而对共产国际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则避而不谈，不少地方还歪曲史实，恶意中伤，这些，读者都不难发现，可以进一步分析研究。

由于我们视野不广，所收论文必有偏颇。全书译文多半为新译，少量曾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过，这次出版也重新翻译。马贵凡同志对书稿作了许多工作，陈为汉同志根据俄文为本书各篇译文作了统一的审阅处理。

徐正明 许俊基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

运动的发展·····	P·A·米罗维茨卡娅 1
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料·····	M·A·佩尔西茨13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略·····	K·B·舍维廖夫30
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援助 (1920—1922年)·····	A·И·卡尔图诺娃48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形成(1920—1927年)·····	B·И·格鲁宁61
中国统一战线的经过史和中 国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	K·B·舍维廖夫 122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制定 统一战线策略的帮助 (1920—1923年)·····	B·И·格鲁宁 138
1921—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 孙逸仙之间合作的建立·····	M·Φ·尤里耶夫 157
共产国际与国民党改组的一 些问题·····	A·И·卡尔图诺娃 182
关于1926年“三·二〇”事件	

后的中共策略问题	В. И. 格鲁宁	195
1925—1927年中国革命问题		
.....	В. И. 格鲁宁 М. Ф. 尤里耶夫	211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与1925—1927年革命的教训	В. И. 格鲁宁	232
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工人运		
动政策中的作用	Т. Н. 阿卡托娃	250
共产国际与在苏维埃口号下		
进行的中国革命运动(1928—1930年)		
.....	А. М. 格里哥里耶夫	272
论遵义会议	А. С. 季托夫	306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	К. Б. 库库什金	323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		
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年)	А. С. 季托夫	344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节译)		
.....	А. С. 季托夫	360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А. С. 季托夫	384
附：苏联学者小注		399

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P·A·米罗维茨卡娅

世界事变的发展一再证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包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进程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影响，促进着殖民奴役体制的迅速消灭。这个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是一个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事实，即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古典”形式不复存在了。

在纪念十月革命六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又重新回忆起十月革命后最初的六年，回忆起当时东方被奴役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高涨时期。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主流在思想上的深远影响，早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几年，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解放斗争的特点。大家知道，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代表就在寻找一条能够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摆脱落后和贫困状态的道路而没有结果，虽然当时中国的思想家和实际革命者曾经很模糊地提出了关于将来的国家的设想。就在毗邻中国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而且，在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打败了国内反动派之后，十月革命证明自己能够自卫。当然，中国进步的社会人士，象其它国家进步的社会人士一

样，以浓厚兴趣来迎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消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瞿秋白这样写道，中国舆论界转而注意到“至今从未听到过的旧社会倾覆的轰隆声……，人人都想了解这个革命的实质，进一步认识俄国的文明……。”〔1〕

中国的进步人士祝贺俄国革命的胜利。在孙逸仙给苏维埃政府的电报中，他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2〕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他的一些著名的文章中，祝贺十月革命，说它是“新世界文明的曙光”。〔3〕他在北京大学的墙报上，在《晨报》和其他报纸的文章中，号召仔细倾听按照自由与人道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新俄罗斯的消息，并强调指出，在“流传着各种诽谤和中伤”的情况下应当“使人民学习和认识布尔什维主义，应该向社会宣讲布尔什维主义的真理。”〔4〕

应当记住，当时中国很缺乏关于俄国革命的消息，而只能得到一些带偶然性的报道，对事件的本质和连续性的反映是极不精确的。西方的报刊（当时国外消息的主要来源）多次预言苏维埃国家很快就要覆灭。况且，中国广大社会人士对俄国事变的本质的理解，由于一系列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包括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已经复杂化了。中国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实质上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虽然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零星报道早在二十世纪初即已传入中国，成为极少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财富。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为领导者的反对封建基础和要求发展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是二十世纪初二十年前后社会力量增长的反映。但主要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在这个时期不能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消息的主要来源是事件的目击者和参加者的叙述。这首先是从俄国回国的中国工人的叙述〔5〕以及偶尔刊登在西方报刊上的西方记者与政治活动家对苏俄的印象和会见苏维

埃共和国领导人的观感。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蔡元培谈到，回国的中国工人把“胜利了的国家的光荣”带回了中国。

通过当时的报刊，细心的读者毕竟能够了解到俄国工人和农民获得了政权，十月革命根本不同于过去的革命。在一些报纸和杂志（《太平洋》、《东方》）上，有时也介绍一点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政策措施和政策法令的材料——关于和平法令和停止战争法令、关于分配土地给农民的法令、关于进行选举的法令、关于对生产实行工人监督的法令等。但是，俄国新政权的阶级性质未必为中国的广大读者所理解。

在中国的报刊中，公布了关于废除沙皇俄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消息⁽⁶⁾。进步报纸《民国日报》、《北京日报》刊载了关于苏维埃政权在对日关系中持否定态度的政策，众所周知，日本当时变本加厉地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刊载了苏维埃对外政策中爱好和平的原则，正如许多文章所指出的，这就巩固了苏维埃俄国的国际环境。还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给边区士兵代表苏维埃国际局的训令的结尾部分，它首先提出号召：“如果中国人民想要反击日本和欧洲的资本家，想要同暴政以及非正义行为进行斗争，他们就应当同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因为俄国是一切被压迫人民的最好朋友。”

报纸还刊载了一些比较客观地评论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原则和外交实践，特别是它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的文章。例如1918年5月27日《民国日报》写道：“俄国新政府……根据不干涉的原则竭力反对压迫政策……并且为了各国人民得到幸福而做出一切……它表示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极为不满……俄国的列宁政府巩固起来了，因为它遵循不干涉的、爱好和平的原则。对中国来说，这是值得效法的榜样。”在《东方》、《劳动》等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报导了列宁的活动。还刊载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

领袖的简略生平》(7)。

在中国与俄国实际上处于隔绝状态条件下，只有个别杰出的聪明才智之士能够表现出对十月革命思想的真正向往，尤其是要提高到对它的基础的理解。在他们中间，最早当推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还有瞿秋白、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不仅欢迎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且从俄国革命中看到自己的未来。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所写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Pan·ism之失败与Democracy之胜利》（1918年7月）、《Bolshevism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中，他在中国最先谈到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称十月革命是“自由的曙光”。他断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

为了使全国舆论界注意到俄国发生的事情，他进行了很多活动，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在他经常地发表在首都和外省进步期刊的文章中，在给北京大学学生的讲课中，他讲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发展规律等专题；在师范大学和女师大，他讲了社会学、历史哲学和妇女运动史，他阐述了在俄国发生的事件的实质，同时特别注意到十月革命的特点、苏维埃政权对内对外政策的特点。他和他最亲近的同志们做了大量工作，为的是使俄国事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应有的地位，使中国的爱国主义者“愿意了解这个革命的实质”（9）。他们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

在二十世纪头二十五年里，对于中国来说，取得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比如，在凡尔赛会议期间，中国人的希望和失望，是大家都知道的。正因为如此，苏俄的对外政策乃是苏联现实的体现，这对于中国全部民主力量的共同看法可

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它注意到十月革命。

随着工人阶级政权在俄国的建立，各国无产阶级民族队伍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国际主义成了苏维埃国家制定政策的根本原则之一。遵循国际主义思想，苏维埃国家也建立了同东方各国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遵循还在十月革命前就制定的对外政策纲领，竭力加强同中国建立新的、真正友好和平等的关系。

大家知道，在1917年至1918年之间，苏维埃政府准备根据完全平等的原则，就建立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问题，同中国在彼得格勒的大使进行谈判。苏维埃政府表示愿意就放弃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租让权、“义和团”赔款（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中国应付给俄国的赔款，按1901年的价格计算为一亿八千四百万卢布）等问题进行谈判。苏联政府恢复了中国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带的主权，并建议讨论可以提前赎回这条铁路，而以中国在建设中东铁路的投资或者以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作为赔偿。苏维埃政府声明废除下述不平等条约，即1901年的北京议定书，以及1907年至1916年的日俄密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¹⁰⁾。根据这些条约沙俄享有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和租让经营权（包括划归铁路使用的地带），以及在满洲划分势力范围。

这个纲领就是把沙皇政府在中国人民那里单独或者伙同日本及其他同盟者夺取的一切又归还给中国人民。

1918年7月4日，苏维埃政府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中，确定了中苏关系问题的方针。

苏联政策不仅宣告了符合中苏两国人民利益的对华方针，而且根据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积极争取发展同这个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关系。苏联不断地表现出主动精神。但是直到1920年

春天以前，中国报刊对苏联外交政策纲领的报导还是零零星星、若断若续的。一九二〇年春天，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中国的群众性通讯机构用汉语和西语登载了著名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委员会1919年7月25日《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双方政府》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曾三次重申苏联发展同中国关系的纲领⁽¹¹⁾。从这时起，中国的社会舆论成了推动本国政府调整同苏联关系的积极力量，而争取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运动也就日益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给了它新的鼓舞。这样，苏联的对外政策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国家的巩固，唤醒了中国的革命者，使他们把自己国家的历史命运问题提高到新的基础上来讨论，并且使他们中间有远见的人学会了按照新的方式提出民族和社会解放的问题。从“五四”时期开始，在中国主要的革命派别中发生了一种从分散的宣传活动转入群众性的民族革命运动的转变，并开始重视中国革命可能的同盟者。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对苏联的态度成了划分中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分界线，同样地在东方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政治的进程，包括解放的进程，在得到新的推动之后，大大地加快了步伐。

遵循着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苏维埃国家与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和帮助了中国的爱国志士，他们正在讨论中国的解放运动、国际形势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建党以及其他方面的经验。各国革命者从苏维埃国家找到了自己精神和物质的支柱。

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的思想影响，最集中的表现是在较短的历史时间里开始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小组，而在1921年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主要组成部分则是联共（布）。国际在协助中共制定

对中国革命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党的理论的和政治的原则的同时，还给了必要的组织上的支持^{〔12〕}。在这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遵循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可以超越资本主义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指示。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发展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阶段。这个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胜利。这个胜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布尔什维克在争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团结了俄国各民族的劳动人民。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高涨。苏维埃国家和受帝国主义压迫而掀起解放斗争的人民的国际主义合作的新纪元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文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在这些文献中，着重强调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被宣布为党的斗争的根本目的。按照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制定了一个最低纲领：提出了同军阀集团和官僚进行斗争的口号，以保卫民主自由。

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水平不是很高的。这可以由以下的明显事实来证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片断知识，仅仅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才开始转变为中国社会先锋队的世界观体系和思想信仰。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最初年代里，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版出版了：《雇佣劳动与资本》（1919年）、《共产党宣言》（1920年）、《工资、价格和利润》（1922年）。1919年9月，列宁所著《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开始用中文出版了。在中国共产党建立（1921年7月）以前，仅有十篇列宁著作被翻译出来，其中包括《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伟大的创举》、